

中国禅学丛书

季羨林 吴亨根等著

禅学

禅与

东方

文化

商务印书馆  
有限公司

3.5  
82

中国禅学丛书

# 禅与东方文化

季羨林 吴亨根 等著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一九九六年 北京

## 中国禅学丛书

**主编** 季羨林  
**编委** 王文宏 卢东文 刘 焯\*  
任雪芳\* 李思敬 李 铮  
季羨林 张德明 钱王驹  
黄河涛  
(带\*者为常务编委)

CHAN YU DONGFANG WENHUA

### 禅与东方文化

**作 者** 季羨林 吴亨根 等  
**责任编辑** 任雪芳  
**装帧设计** 曹 洁  
**出 版**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北京东四南大街85号 邮政编码 100703)  
**印 刷** 河北三河市艺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260千字  
**开 本** 850×1092mm 1/32  
**版 次** 1996年2月北京第1版  
199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3-028-1/B·4  
**定 价** 19元

# 序 言

现在全世界都在关心禅，因为它是东方文化宝库中令人瞩目的瑰宝。历史上中国禅宗的诞生，使中国佛教有了大的革新和发展。禅在古代中国影响于诗歌、绘画、园林、书法、风俗等广泛的文化领域。文化是每个民族智慧的集中表现。每种文化都打上了各民族独特的印记；但是，它又是在各种文化的互相交流、撞击中向前发展并得到繁荣。中国古代禅文化的繁荣就是一个杰出的例证。

中国和韩国在佛教方面的交往，历史十分悠远；只是近半个世纪却相知甚少。1990年夏，季羨林教授邀请韩国东国大学佛教学学院院长吴亨根教授等访问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开端。当我听到“东国”两个字时，不由得亲切地回忆起《祖堂集》记的新罗高僧道允禅师。他在唐代投南泉普愿禅师门下，获得心印。南泉禅师曾赞叹他：“吾宗之法印，唯归东国耳。”在唐代，中国的长安，新罗的庆洲、日本的奈良都是亚洲的文化中心，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当我们与吴亨根教授一起回忆到《五灯会元》中记录许多古代的佛教界前辈互相交往的事实时，大家的心就一下子相通了。我们之间的学术友谊，有历史作为基础，容易找到互相对话的主题，于是商定共同写一本研究禅的著作，约请两国学者写作，用两种文字分别在北京和汉城出版。

以后，季羨林教授访问汉城的时候，又与吴亨根教授商定这本文集的工作。吴亨根教授为了这

件事，多次来北京；还利用到澳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在那里与季羨林教授会晤。那些年，北京和汉城之间没有通航，互相来往都得绕道香港，增加了一些困难。谈到这些，大家自豪地说：这次学术交往走在政治的前面了。我因为这时期正协助季羨林教授编辑《中国禅学丛书》，得以参预其事而深感荣幸；同时也感悟到“万事开头难”的意味深长。这本文集除了它本身的理论意义外，将作为中国和韩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新开端，存留于人间。

本文集中文方面的作者，有前辈学者季羨林教授、任继愈教授，也有各方面学者的共同参加。特别应感谢南怀瑾先生远隔海峡的热情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台湾老古文化事业公司总编辑刘雨虹女士帮助联络，付出辛勤的努力。我以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念：禅产生于古代，却值得现代人关心；禅诞生于东方，研究禅却是属于全世界的。

在本书出版之际，我应感谢出了很大力量的吴亨根教授，感谢为本文集撰稿的韩国学者，特别要感谢资助本项研究的韩国鲜京集团崔钟贤会长。承延边大学姜孟山教授、卢东文教授组织延边大学的学者进行了有效的翻译，又审阅译文；延边大学王文宏女士协助做了许多工作。北京大学杨通方教授自始至终帮助策划和做了许多工作。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承担了繁重的出版任务。这本书是大家协作的成果。中国和韩国学者之间的交流，目前刚是新的开始，我相信，前景一定更为光辉灿烂。

刘 垣

1995. 1. 20

# 序

# 言

韩国和中国因为地理上邻近,自古以来就有佛教文化方面的交流,而且关系非常紧密。韩国佛教从三国时代跟中国佛教开始交流,到了新罗、高丽时期就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

韩中两国的佛教,在禅思想、华严学、唯识学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结果使两国佛教趋于隆盛,成为两个国家精神文化方面的一个根基。韩国和中国佛教文化的根基是一致的。因此,两国的信仰、生活、学术都能很好地进行交流,彼此之间都很协调,这种传统从古代一直发展到现代。以这种协调精神作为基础的文化交流的传统,近期由于人为的原因中断了。

中国的慧能大师曾说过,人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由此可见,两国国民佛性是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由于政治的原因,世界分成东西两大阵营,韩中文化交流中断了。近来,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东西方的冰结化解了,重新开始了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佛教方面的交流是最先行的。就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得到中国学术界老前辈季羨林先生(前北京大学副校长)的邀请,1990年7月访问了中国,并和季先生一起决定共同进行佛学的研究。季先生又得到高丽大学前校长金俊焯先生的邀请,在韩国作了演讲,主题是东方文化思想将来要成为世界精神的主导力量。

韩国方面的学者与中国方面的学者达到共

识：两国学者再把中断的文化交流恢复起来，活跃起来。从传统的角度说，共同来实现佛心的和合，法界的融合，世界大同的思想，整理东方精神文化的宝贵遗产，实现大乘的理想。

在我们佛教学的领域中，首先研究两国精神文化方面共同性比较多的禅思想，决定以禅和东方文化作为范围，出版论文集。禅思想可以说是东方文化的奇葩。它能使人人类安乐，可以给人类打开智慧的大门。韩国方面由金煥泰博士、金知见博士等执笔，中国方面是季羨林、任继愈等硕学执笔。我本人作为一个共同刊行的委员长，感到十分荣幸。韩国方面的论文，既有达摩禅传入韩国之前的新罗前期的禅学，也有达摩禅传入韩国以后的新罗后期的禅学，还有高丽王朝时期李朝时期的禅思想。今后，我们当然还要共同研究与中国有关的佛教文化的诸多方面：中国广泛传布唯识学的园测法师，广泛传布禅思想的无相大师，还有广泛传播地藏信仰的地藏大师等。对于他们的思想，也还要跟中国学者共同进行研究。

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际，对于尽了很大力量的季羨林先生、北京大学刘焯教授表示感谢。还有，对资助本项研究的鲜京集团的崔钟贤会长表示感谢。今后两国学者要继续共同进行交流，对两国文化发展作出贡献。我相信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对增进韩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与和平会作出贡献。

韩中佛教学术交流会共同刊行委员长 吴亨根

1994. 2. 7

# 目 录

序言	刘 焯(1)
序言	吴亨根(3)
作诗与参禅	季羨林(1)
神秀北宗禅法	任继愈(34)
禅宗与禅定	南怀瑾(50)
论禅宗思想中的内在性和超越性问题	
.....	汤一介(60)
早期禅学与中国石窟艺术	黄河涛(75)
禅与中国文人的园林欣赏情趣	任晓红(98)
禅藏与敦煌禅籍	方广锡(121)
禅与《红楼梦》	王文宏(139)
禅与书法艺术	蒋大康(153)
体验茶禅一味	张德明(172)
禅与严羽的《沧浪诗话》	刘 焯(178)
新罗前期的禅思想	吴亨根(202)
新罗末金海地方的豪族势力与禅宗	
.....	崔柄宪(267)
高丽中期的禅思想	蔡印幻(302)
高丽末期的佛教	李英茂(325)
朝鲜前期禅的系统及其特征	金煥泰(351)
朝鲜后期禅佛教流考	韩基斗(377)
敦煌《坛经》随想录——反省与展望	
.....	金知见(393)
韩国佛教文学溯源	李钟灿(417)
韩中禅画比较研究	文明大(437)



## 作诗与参禅

季羨林

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是我国文学史、美学史、艺术史、思想史等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与中国文化有关的国家,比如韩国和日本等等中,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东方文化中,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自来论之者众矣。

我于此道决非内行里手,只是喜欢涉猎一下而已。而且我的涉猎面虽广,却是浅尝辄止,一点也不够深入。仅就我涉猎所及,我发现谈这个问题的典籍,一千多年以来,多得不得了。一直到今天,此风未息。论文专著,层出不穷。内容丰富,词彩动人,读起来令我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但是,一旦掩卷沉思,则又似乎没有在脑海里留下多少东西,杂乱而浑沌,一点也不明朗。有的人钻研得很深;但是如果理出一点头绪,则又似乎抓不住一条纲,依然是杂乱而浑沌。这问题真有点像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即。我怅然懵然。记得西方某一位名人说过,读别人的书,就好像是让别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我让人在自己脑袋里跑马,次数之多,无法统计了。结果并没能跑出一个所以然来。我在怅然懵然之余,窃不自量力,索性让自己在脑袋里跑一趟马,也许能跑出一点名堂来。既然不是内行里手,跑马难免跑出了圈子,跑入非想非非想中。好在精通此道的真正内行专家到处都有。我相信,他们会把我的马缰绳牢牢抓住的。

我想谈以下几个问题。

## 一、中国古籍中对诗禅关系的看法

作诗,这几乎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所共有的活动,而参禅则似乎只限于中国和同中国有文化渊源关系的少数几个国家。中国的禅宗,虽然名义上来自印度,实则完全是中国的产物。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被尊为东土初祖。据说当年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叶微笑,师徒会心,灵犀一点。这种心法由迦叶传了下来,不知几年几代,传给了达摩。这故事本身就接近神话,印度和中国和尚编的那一套衣钵传承的几祖几祖,又是没法证实的。达摩带到中国来的“法”,当然也就虚无缥缈。反正中国后来的禅宗,同后汉安世高等带进来的禅学,根本不是一码事。总之,禅宗是在中国兴盛起来的。严格地说,禅宗是在五祖弘忍以后才畅行,而大盛于六祖慧能(638—713年)。为什么单单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单单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禅学才能兴旺发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在这里先存而不论。这篇论文写完时,读者也许能从字里行间得到答案。

禅宗思想在中国兴起以前,中国的诗歌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足证作诗与参禅没有必要的联系。但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很多人却把作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系起来。这样的例子真正是举不胜举。我在下面只举出几个来,以便作三隅之反。

禅宗大盛于唐。初、中唐时期,许多大诗人受到禅宗的影响,在创作实践方面,援禅入诗,写了一些禅味极浓

的诗。到了晚唐，在理论方面，有人又把诗与禅紧密联系起来。最著名的代表是司空图。他那许多著名的提法，什么“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等等，是大家都熟悉的。司空图明确地认识到诗禅的一致。他这种以禅说诗的理论，对后世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到了宋朝，禅宗高度发展，广泛流行。士大夫谈禅成风。他们把诗与禅更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我举几个例子：

韩驹《陵阳先生诗》卷一《赠赵伯鱼》：

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

吴可《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

龚相《学诗诗》，《诗人玉屑》卷一：

学诗浑如学参禅，悟了方知岁是年。点铁成金犹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戴复古《论诗十绝》，《石屏诗》卷七：

欲参诗律似参禅，妙趣不由文字传。个里稍关心有悟，发为言句自超然。<sup>①</sup>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不再抄列。这里讲的大半是参禅学诗都要下工夫，“功到自然成”，一朝悟透，诗句便能超然。至

<sup>①</sup> 例子都取自敏泽《中国美学思想史》，第二卷，第二九〇—二九一页，齐鲁书社1989年版。下面还有很多例子，读者可自行参阅。

于禅的内容，基本上没有涉及。

钱钟书《谈艺录》<sup>①</sup>中，也引了许多关于诗禅关系的例子，并发表了很精辟很深刻的意见。请读者自行参阅，不再抄录。

唐宋时代开始的有关诗与禅的意见一直对后代文艺理论的发展以及诗歌的创作，起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艺理论史上，如果没有援禅入诗的活动，中国诗歌的创作和理论，将会是另一种样子。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 二、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上面引证的唐宋诸家学说，都把诗与禅相提并论。其中必有道理，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诗与禅必有共同之处，这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对共同之处作细致的分析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对二者不同之处稍加阐述，这能够加深对共同之处的理解。

从表面上来看，诗与禅的不同之处，是非常明显的。禅宗最初是主张“不立文字”的。这其实是继承了佛家的传统。从历史上来看，释迦牟尼时代，文字还不流行。印度古代，包括婆罗门教在内，师徒都是口口相传。最初既无抄本，当然更谈不到印本。到了很晚的时候，印度教徒还不允许把他们的圣经宝典《吠陀》排印出版。佛教大藏

<sup>①</sup> 补订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八四节。

经里面，有几部讲佛祖生平的经，讲到他年幼时学习了多多少少“书”（文字）。这些经都是晚出的，不代表释迦牟尼时代的真实情况。佛陀不重文字，经中屡有记载，如《大方广宝篋经》卷上云：“不著文字，不执文字”，等等<sup>①</sup>。所以我说，禅宗“不立文字”，是继承了印度佛教传统。后来禅宗却从“不立文字”发展成为“不离文字”。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颇为微妙的问题。下面我还会谈到。

禅是这样，诗则不同。钱钟书说：“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sup>②</sup>

这就是诗与禅的不同之处。

### 三、诗与禅的共同之处

这是本篇论文讨论的重点。

作诗与参禅本来是两种迥然不同的活动。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在禅宗兴起以前，中国诗歌已有极长的历史。在欧美国家，没有什么禅宗，也都有杰出的诗歌创作。可见诗与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在中国，在禅宗兴起和流行以后，在某些诗人身上，诗和禅竟变得密不可分。原因何在呢？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但又并不很容易回答的问题。我先笼统说上几句。禅宗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中国诗，与佛教思想进入中国哲学，几乎是同步的。二者都是滥觞

---

<sup>①</sup> 钱钟书《谈艺录》，第三一〇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一〇一页。

于两晋南北朝，初盛于唐代，大盛于宋代。原因是明显的。佛教入华以后，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察宇宙和人生的新角度，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立即接受下来了。这种解释亦近常识，似乎可以不说；但是不说又似乎不行。不说则很多现象无法讲清楚，诗与禅就属于这一类。说完了这个笼统的解释，还有很多细致深入的解释要去做。可是这决不能毕其功于一役。在下面的论证中，很多地方都会碰到这种解释，要请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了。

对于诗与禅的共同之处，过去的中国诗人和学者和今天的中国诗人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一言以蔽之，他们发现，诗与禅的共同之点就在“悟”或“妙悟”上。我举两个当代的造诣精深的学者的意见，以概其余。第一个是钱钟书。他在《谈艺录》二八《妙悟与参禅》这一节中说：

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或者不好渔洋诗，遂并悟而非之，真因噎废食矣。高忠宪《困学记》云：“平日鄙学者张皇说悟，此时只看作平常，自知从此方好下工夫耳。”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三云：“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唤作悟，唤作物格知至。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按刘壎《隐居通议》卷一论悟二可参阅。又云：“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

下面还有非常精采的意见，文长不具引。请读者自行参阅。钟书君的意见是切中肯綮的。我觉得陆桴亭认为“人性中皆有悟”，就有禅宗色彩。

第二位学者是敏泽。他在《中国美学思想史》<sup>①</sup>中写道：

“禅”与“悟” 宋代禅宗广泛流行，士大夫知识分子谈禅成风，以禅喻诗成为风靡一时的风尚。其结果是将参禅与诗学在一种心理状态上联系起来。参禅须悟禅境，学诗需悟诗境，正是在“悟”这一点上，时人在禅与诗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之点。

敏泽的意见也是切中肯綮的。钟书君与敏泽异曲同工，一脉相承，都说到了点子上。我自无异议。

但是，我总还感到有点不满足。他们讲“悟”或“妙悟”，只讲了这一种思维活动，好像是一个没有宾语的不及物动词。这似乎有点空，需要补充一下，才能显得完整而切实。我觉得，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我们回答：

第一，什么叫“悟”？

第二，“悟”到了什么东西？

这都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据我涉猎所及，好像还没有哪个学者明确而完整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回答也就更谈不到。我现在不自量力，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两个问题。

先谈第一个问题。《说文》：“悟，觉也。从心，吾声。”这说明，这个字是中国早就有的。可是自从佛教传入以后，在汉译佛经中，“悟”就变成了一个佛教术语，被赋予

<sup>①</sup> 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二卷，第二九〇页。

了以前不可能有的含义。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我们先看一看，在梵文和巴利文中与汉文“悟”字相当的是些什么字。归纳起来，梵文和巴利文约略有三个动词与“悟”字相当：

第一个是√ budh，前面可以加上词头 pra 等等，意思是“醒”、“觉”、“悟”；

第二个是√ vid，前面可以加上词头 sam 等等，意思是“知道”；

第三个是√ jñā，前面可以加上词头 ā 等等，意思是“知道”。

其中以第一个√ budh 为最重要。汉译“佛陀”，在梵文和巴利文中是 buddha，是√ budh 的过去分词，意思是“已经觉悟了的人”，“觉者”，“悟者”。佛祖就是一个“觉者”、“悟者”。可见这个“悟”字的重要意义。我的第一个问题：什么叫“悟”？答案：这就叫“悟”。

第二个问题：“悟”到了什么东西？必须同上面说的这些东西联系起来，才能给予准确的答案。光是“悟”，决不能成佛，必定是“悟”到了什么重要的真理，才能成佛作祖。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回答要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小乘层次，算是低层；一个是大乘层次，是高层。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金刚座上，大彻大悟，成了佛。他悟到的当然还是小乘的真理。内容是什么？虽然他没有明说，其实还是颇为清楚的。他成佛后在鹿野苑首转法轮，讲的应该就是他不久前悟到的真理。关于首转法轮，各种语言的佛经上有大量的记载，说法虽不尽相同，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可靠性毋庸过分怀疑。为了把初转法轮的内容



比较详尽地介绍出来，我从唐天竺三藏地婆诃罗译的《方广大庄严经》卷十一《转法轮品》中把如来说法的内容抄在下面：

如来于初夜时，默然而过。于中夜分，安慰大众，令生欢喜。至后夜已，唤五跋陀罗而告之言：汝等应知，出家之人有二种障。何等为二？一者心著欲境而不能离。是下劣人无识凡愚，非圣所行，不应道理，非解脱因，非离欲因，非神通因，非成佛因，非涅槃因。二者不正思惟，自苦其身而求出离。过现未来皆受苦报。比丘！汝等当舍如是二边。我今为汝说于中道。汝应谛听，常勤修习。何为中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如是八法名为中道。

佛告诸比丘：有四圣谛。何等为四？所谓苦谛、苦集谛、苦灭谛、证苦灭道谛。比丘！何等名为苦圣谛？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蕴苦。如是名为苦圣谛。何等名为苦集圣谛？所谓爱取有，喜与贪俱，怖求圣乐。如是名为苦集圣谛。何等名为苦灭圣谛？所谓爱取有，喜与贪俱，怖求圣乐，尽此一切。如是名为苦灭圣谛。何等名为证苦灭圣谛？即八圣道，所谓正见，乃至正定。此即名为证苦灭圣道谛。<sup>①</sup>

初转法轮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个样子。后来初期佛教教义被归纳成三句话，称之为“三相”或者“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释迦牟尼首转法轮，这三个法印

<sup>①</sup>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三，第六〇七页。